

让运城红色文化薪火相传

卢天狮
秦建华

红色文化是革命战争年代创造的极具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红色文化分为物质性文化和精神性文化,主要包括遗址遗迹、建筑与设施、重要革命历史文物、重要艺术作品等,主要表现为历史遗存和革命纪念场所、革命英烈奋斗故事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地地方考察调研时多次到访革命纪念地、瞻仰革命历史纪念场所,反复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

运城地处晋南,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源地之一。运城红色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是无数英雄儿女在争取民族解放、革命胜利、祖国建设过程中保留下来的物质和精神财富。近年来,运城红色文化资源的传承和弘扬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

运城红色文化的时代特征

运城的红色文化印记基本上是踏着中国共产党的足迹走过来的。1925年冬,运城发展了第一批共产党员。1926年,运城迅速成立了第一个党支部。从此,运城的红色文化逐渐星火燎原,熠熠生辉。土地革命时期,运城一度是山西共产党的发展斗争中心。特别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这里是通往延安革命圣地的重要咽喉、交通要道,以及重要战场。仅新中国成立前,为民主革命壮烈牺牲的英雄儿女就达6100余人。打开运城红色文化的密码,我们不难发现它与中国红色文化一脉相承的,闪烁着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其时代特征也极为鲜明。

前仆后继、自强不息——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锤炼,一批又一批的革命精英层出不穷。涌现出张汉民、杜任之、丁行、樊耕农、阎又文等一批隐蔽战线上的英雄人物,涌现出张英才、刘红娃、董克荣、张象山、卫根柱等著名的战斗英雄,涌现出牛钱线、景萍、樊旦、王光、崔红等一批革命女英烈,涌现出像嘉康杰、王娥娥、王林青、赵勤生、陈民超、阴勃然、杨作杰等一批毁家纾难的革命家庭,等等。从运城还走出了程子华、姬鹏飞、李雪峰、傅作义、董其武5位高级别领导人;走出了王鸿钧、邓国栋、阴凯卿、冯彦俊、阎子祥、裴丽生、郑林、卫逢祺、张天乙、曹普等10余位山西省党政领导干部;走出了张烨、孙雨亭、李哲人、贾启允、乔明甫、梁文英、傅子和、罗文治、王观潮、罗毅、孙岳等省部级领导干部;走出了常乾坤、谷景生、车敏畴、张世珍、王兰麟、茹夫一、杨文安、卞明智、李文一、贺明、胡尚礼、柴启琨等13位开国将军;走出了首任驻美大使柴泽民以及姚仲康等一批杰出的外交家。

视死如归、英勇无畏——运城古时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是经济、军事的重要战略地,不论是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都发生过许多具有较大影响的事件。中条山战役,数万名爱国官兵奋勇抵抗,用血肉之躯对抗敌人的精良武器。解放运城战役,历时八个月,三次攻打,体现了我军战士坚忍不拔的意志力和有勇有谋的军事战略。被称为“耶律祥爆破小组”的成员在战役中创造了小组连续爆破法,采用单兵爆破、小组突击的方法,连续炸掉七个碉堡,而小组成员无一伤亡。运城战役的彻底胜利,提高了我军将士的战斗意识和革命斗志,坚定了我军解放全国城市的信念,动摇了国民党依靠城市打反战战的信心。

为国为民、追求卓越——运城红色文化体现的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魂。从1926年中共运城支部的诞生,到1928年中共河东特委的成立,虽然历经腥风血雨,但党的活动从未停止。特别是1934年初到1937年,运城党组织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后,一直在嘉康杰等同志领导下,独立开展革命活动,成立了绛县红军游击队和晋南红军游击队,组织了平陆夺枪、稷王山暴动、中条山暴动等斗争,谱写了一曲曲惊心动魄的革命华章。从建党初期的党员身上,可以看出革命先辈崇尚真理、不忘初心、追求共产主义的求真精神;在中条山战役中,可以看出抗日军民不怕困难、不畏牺牲的奉献精神;在“三打运城”中可以看出革命志士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由敌后根据地的建立上可以看出运城人民群众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自立精神。

革命遗址,震古烁今——运城红色文化资源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地域独特,特色鲜明。运城是山西有名的革命老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发挥了不同寻常的重要作用,拥有红色革命遗址225处,其中重要历史事件和重要机构旧址54处,重要历史事件及人物活动纪念馆41处,革命领导人故居28处,烈士墓54处,纪念馆48处。运城红色文化资源基本贯穿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各个历史时期,具有历史跨度大且连续不断的特点,像“河东的西柏坡”——闻喜县陈家庄太岳三地机关旧址,晋南革命圣地——韩家岭,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讲坛——夏县堆云洞中共河东特委活动旧址等,都承载着红色文化的记忆。

运城红色文化的时代价值

虽然运城红色文化主要产生发展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到新中国成立之前,但它的时代价值远远超越时空,影响深远。在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征程上,传承弘扬运城红色文化,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一是有益于增强道路自信。运城红色文化凝聚着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浴火重生的执着信念。当前,红色文化产业成为新兴热门产业,红色旅游成为运城旅游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红色文化和生态文化交相辉映,红色文化与红色文创相得益彰。传承红色文化,坚定道路自信,将思想教育融入文化生活、娱乐生活、旅游生活,将红色文化转换成促进经济发展的优势资源,有助于推进运城文化旅游产业的长足发展,进而,让广大人民群众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二是有益于增强理论自信。用科学理论和革命传统培养人、教育人,是党和人民事业永葆青春和不断向前的重要保障。利用运城红色文化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将发生在人民身边的红色革命史实和现代人民幸福生活结合起来,让人们获得启迪,能增加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吸引力和说服力。目前,我国正处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转变阶段,矛盾和风险比从低收入迈向中等收入时更多更复杂。这说明我们更需要用红色文化凝聚人心,统一思想认识,牢固树立文化认同感和自信心。只有这样,才能把建党以来不断形成和不断成熟的一系列思想理论坚持下去,更好地发挥党的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

三是有益于增强制度自信。运城红色文化体现了革命斗争波澜壮阔的轨迹。运城解放战争的胜利,“晋家峪拉锯战”的胜利等体现了运城红色文化的政治价值,昭示出其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它是为人民树立正确政治方向的说明书,对广大人民群众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坚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有着政治导向功能。

四是有益于增强文化自信。红色文化是中国人民对民族精神、国家特质和时代特质的自我界定,是在世界文化大格局中不断演进、融合、重构的文化形态,是我国宝贵的精神财富与文化资源,具有重要的文化传承价值。运城红色文化种类丰富、形式多样,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坚定文化自信的指导。只有牢记红色文化,才能汲取历史经验教训,从而让我们的文化在发展中坚持自己的主旋律。

运城红色文化的传承路径

先辈们创造的运城红色文化需要代代相传。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实现运城政治稳定、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就应该让运城红色文化活起来、传下去。

一、搞好顶层设计,加强设施建设,打造红色文化教育阵地。对红色文化遗址,该抢救的抢救,该保护的保护,该升级的升级,筑牢线下红色教育阵地,建立完整的红色文化资源档案库、基础信息数据库,绘制红色文化资源电子地图,配套影音资源并及时更新,推动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化保护。同时,开辟线上红色教育阵地,打造集资源信息、文献、短视频、音频、活动等于一体的线上教育云平台,实现数字资源云端互联互通。通过线上线下共同发力,强化红色文化的广泛宣传和传承。

二、整合红色资源,促进文旅融合,打造精品研学路线。将“旅游”和“教育”相融合,建设思政“移动课堂”。通过整合具备参观条件的红色旅游景点、革命纪念馆、旧址故居等,以点串线,形成红色旅游主题线路,让人们跟随历史脚步,探寻珍贵历史印记,聆听英雄故事,缅怀革命先烈。

三、拓展教育渠道,丰富教育形式,打造系列主题展览。在图书馆、高校等具有研究能力的机构成立专题小组,深入挖掘各历史事件背后所蕴含的深刻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精神内核,生动讲述红色故事,组织红色宣讲队走进机关、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让红色文化更加立体可感。在展览中,要丰富展陈内容,确保准确翔实,增强史料的全面性和真实性。要创新展览形式,采用图文展板、实物展示、声光电结合、线上线下联动等多种手段,引入AI、AR、VR等创新技术,营造情景式、沉浸式、体验式的红色文化教育场景,增强共鸣效果,让群众身临其境地体会到革命先烈的艰难困苦与英勇无畏。

四、发挥资源优势,完善产业链条,打造特色文化产品。由于红色旧址乡村分布较多,譬如夏县的文德村、新绛的西庄村、盐湖的牛庄村和上段村、闻喜的裴社村、万荣的陈陶村、平陆的沙口村等数十处惨案发生地,以及夏县的堆云洞和韩家岭、闻喜的陈家庄、绛县的迴马岭等党组织革命旧址都在乡村发挥着重要作用。所以,要借助社会力量,适时在乡镇建立“景区联动、红绿融合、旅居一体”的乡村旅游示范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同时,积极拓展红色研学、红色休闲、康养基地等新型业态旅游产品,支持红色影视基地建设,推进红色主题歌曲、影视剧、微电影、歌舞剧、纪录片、动漫等文艺精品创作制作,创造符合现代人审美和认知的红色文化精神产品。开展红色文化论坛、革命歌曲大赛、红色文化知识竞赛、诵读红色经典等主题活动,放大红色文化资源的社会效应,提升文化品牌传播力和影响力。

五、建立宣传矩阵,扩大宣传效果,打造立体宣传格局。以微信客户端、网站、抖音等多个新媒体服务端口为平台,以探索服务创新为重点,坚持主流媒体和自媒体相结合、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相融合,通过全媒体渠道,积极构建“5G+旅游”等新模式,建立融媒体宣传矩阵,全方位增强红色文化公众吸引力、传播力和影响力。同时,以受众为核心,以多元化、集成性产品为基础,拓展服务深度,延伸服务半径,采用图片、视频、H5等大众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从选题、标题制作、样式设计等方面对信息予以包装,改善受众的阅读体验,增强宣传效果。

(作者分别系市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学术顾问)

文化谈丛

运城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联办
运城市三晋文化研究会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盐湖区试点探班

本报记者 牛嘉荣 文\图

3月15日早8时,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盐湖区试点普查队陆续出发。

11支普查队以盐湖为中心,深入调查环湖8个乡镇(街道)的201处不可移动文物,其中有“武庙之冠”解州关帝祖庙,也有未经发掘的周代遗址。普查队队员们身穿红马甲,点亮了盐湖区不可移动文物的地理坐标。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试点工作(以下简称“四普”)全面启动,全国范围内共有13个县(区)和2个军队管区被确定为国家级普查试点,盐湖区是全省唯一的国家级普查试点,也是全类型省级普查试点。

“普查工作开展前一定要研究好、比对好第三次文物普查的成果资料,遇到地理位置不清楚的地方,要学会根据已有资料划定范围……”市文保中心文物资源科技部主任王立忠给队员强调着要点,“因为等待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盐湖区普查队工作现场。

无人机就位,今天出发就稍迟了点。”

当天小队第一站来到弯子文昌阁,确定名称、调查时间、地理坐标、类别、年代、测量、绘图、定点、观察周边环境、上报存在问题……“四普”工作的有序推进,需要每一位普查员的专业和细

致,同时还要在工作中拥有应对变化的能力,更要有采用最新技术查清汇总文物基础信息的能力。”王立忠说。

有一处东周时期的遗址难倒了普查队员:“王老师,遗址的边界范围如何确定?如何确定遗址没有被破坏呢?”

“四普”的调查不仅仅是

数据信息的进一步精确,更是双脚寻访文物的历程。“首先,要依据‘三普’资料确定范围,了解基本信息,相信数据。在面对不准确的地理位置时,根据周边环境划定范围。要想证明这里是遗址,就要走进这片土地,看能不能找到遗存的该时期的陶片。”一边说,王立忠带领队员朝深处走去,这时已经没有道路的痕迹,周围都是枯树枝。

普查队一边“开路”,一边将目光紧锁散落在地面上的石片。“这块就是现代砖石,没有特征。”王立忠讲解完将石片扔掉,又捡起一块,“大家看上面的纹饰,属于该时期陶器的典型特征,找到陶片了!”找到陶片不算结束,普查队立刻就要用现有设备拍照留影,记录发现陶片的地点。

中午12时,普查队陆续回到金鑫大酒店,吃饭的间隙,大家还坐在一起讨论文物普查行程的新收获。

国家级非遗项目“董永传说”开发研讨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 乔植)为深入挖掘“董永传说”蕴含的保护价值,近日,万荣县举行国家级非遗项目“董永传说”开发研讨会。

“董永传说”是一部中国民间传说的经典,更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很

高的文化研究价值,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2006年,万荣县前小淮村的“董永传说”,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由于民众情感的渗透和口碑的附会,产生了富有地方特色的“董永传说”,也留下相关风俗以及与董永身

世有关的文物、碑碣、村落、祠堂、地名等遗迹。

董学文作为“董永传说”的传承人,他通过实物观看、查阅资料、现场解说等方式介绍了“董永传说”调查挖掘、人文底蕴、保护价值、存在问题等情况。与会人员就问题情

况开展了激烈的讨论,以各自多年调研、考察的经验结合实际为该项目的保护、传承与发展进行了经验分享,并提出了今后重点研究推广的方向。

本次研讨会的成功举办,为万荣县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注入了新的动力。下一步,万荣县将进一步发展非遗文化,让无形文化有形可触,使非遗文化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近日,稷山县西社镇范家庄村内,村民们聚在一起,观看“二月二”节庆表演。

当日,村民们身着节日盛装,表演了敲锣鼓、扭秧歌、划旱船、耍狮子、舞龙等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欢庆传统古节。

特约摄影 史云平 摄

本版责编 游映霞
美 编 冯满楠
校 对 李静坤

文化茶座

许浑诗中的乡愁品味

■ 祁世坤

唐诗中不乏乡愁之作,这里从与蒲州有关的两首说起。先看李益的《登鹳雀楼》:

鹳雀楼西百尺梯,
汀洲云树共茫茫。
汉家箫鼓空流水,
魏国山河半夕阳。
事去千年犹恨速,
愁来一日即增长。
风烟并起愁望,
远目非春亦自伤。

再看许浑的《咸阳城西楼晚眺》:

一上高楼万里愁,
蒹葭杨柳似汀洲。
溪云初起日沉阁,
山雨欲来风满楼。
鸟下绿芜秦苑夕,
蝉鸣黄叶汉宫秋。
行人莫问当年事,
故国东来渭水流。

两个诗人都不是蒲州人,一是姑臧人,今甘肃天水,一是江苏丹阳人,然而李益在蒲州有姑表外弟卢纶,也算有亲可投,而许浑呢?是蒲州吗?后面再论。先说李益的诗,诗中已经点明“远目非春”,写的是春愁,有伤春之感;许浑的诗点明“蝉鸣黄叶”,写的是秋愁。细看这两首诗,都有着近似的意境和景物描写,本也无妨。两首诗只首句“汀洲云树共茫茫”和“蒹葭杨柳似汀洲”,就颇多疑。那么是谁抄了

谁的?因为许浑是晚于李益的诗人,然而能这样说是后者抄了前者吗?按理说也不通,你能那样写,我就不能那样写吗?若非后者对前者的借鉴,那也可能是“英雄所见略同”。

如前所说,李益是天水人,诗写的是蒲地景色,而许浑非蒲州人,偏要作蒲州人论。且看他的《咸阳城西楼晚眺》诗,就凭那诗末一句“故国东来渭水流”。《唐诗三百首》有注:许浑,字用晦,涑州丹阳(今属江苏)人,唐太和年间进士,官虞都员外郎,睦郢二州刺史,其诗长于律体。这样说,他的乡愁应是南国。然诗中却见“故国东来渭水流”,这故国即是故乡,东来就是说来自蒲地。说是蒲地,他还另有诗为证。他的《秋日赴阙题潼关驿楼》,又名《行次潼关逢魏扶东归》,诗中说他去长安应试,在潼关同魏扶相遇,也许是新的结识,他们又能豪饮,无所不谈。魏扶东归要去蒲州,许浑不厌其烦地讲给他那里的所见所闻,当然是如数家珍般的熟稔。他的这首诗是:

红叶晚萧萧,长亭酒一瓢。
残云归太华,疏雨过中条。
树色随关迥,河声入海遥。
帝乡明日到,犹自梦渔樵。
写的也是深秋景象。在他的笔下,总觉得有一种浓浓的

乡愁。他是把蒲地作为故乡,甚至有点乐不思蜀的情味了。他去长安应试,半途竟然在睡梦里犯了乡愁。何况以后到了咸阳,哪里还有久留之心呢?乡愁,词语解释意指深切思念家乡忧伤的心情,一种对故乡眷恋的情感状态。然而而为诗,更见浓烈。许浑在《秋日赴阙》诗里,还有一种“梦里不知身是客,直把他乡作故乡”的情味。说是梦里之事,也可理解,在《咸阳城西楼晚眺》诗里,则是明明白白地大发感慨。

下面再说说他诗中的内容,“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鸟下绿芜秦苑夕,蝉鸣黄叶汉宫秋”。这分别是律诗的颌句和颈句,单独挑出来就是一首精美的绝句。这和李益的诗应该说没有碰撞,但和韩翃《同题仙游观》诗,诗人在唐建中初年南阳人,仙游观在秦地麟游县,诗人游玩,即景生情。诗的颌句“山色遥连秦树晚,砧声近报汉宫秋”,诗诗颈句有“秦苑夕”,和韩诗“秦树晚”,意思相同,其的“汉宫秋”,二者竟然同语,这样说来,怕不是借罢了。然这也无妨,化用一下么,用到这里非常合适。就总体来看,诗人状景写物,淋漓尽致,诗

题是“咸阳城西楼晚眺”,正是“日沉阁”时分,即俗语谚语的“老云接驾,不是阴就是下(雨)”,不见山雨欲来风满楼吗?接着就是那句化用之语了。飞鸟急于归巢,然蝉噪却烦人地嘶鸣,都加重着这沉闷的氛围。

说到愁,按说诗贵含蓄,诗中说愁,却不见一“愁”字,方为高品。许浑的这首诗如果没有那个一开始就有的愁字,绝对就是个上上品的诗作了。或借谓“不著一(愁)字,尽见风流”。然则这也难矣。不见崔颢、李白这样的前朝大家在时相竞胜中也不避嫌,如崔颢的《黄鹤楼》诗,尾句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李白为步其韵,在《登金陵凤凰台》诗的尾句也是“长安不见使人愁”吗?

这里还想说说许浑的蒲州籍问题,这怕也与蒲州的“诗国酒都”有着密切的关系。虽说唐人饮酒,少不了吟诗作赋,诸多优美的诗篇多是在纵酒狂饮之中完成的。所以唐代文人学士举行的宴会,也统称“文酒之宴”或为“文会”,就是以酒会友,以(诗)文会友。可以想象,唐时的蒲州,凭着这“诗国酒都”之誉,也曾汇聚了一大批知名诗人,形成了蒲州的诗人群体。许浑也当是酗酒诗人,不见他有“长亭酒一瓢”的痛饮吗?这也可以说他是“醉里已忘身是客,早把蒲乡当故国”了。而当时的蒲州也痛快大方地接纳了这位诗人,而他确实也为蒲州贡献了毕生的才华,光耀了大唐蒲州的诗坛风采。